

張政烺文集

苑峰雜著



中華書局



張政烺文集

苑峰雜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苑峰雜著/張政烺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2.4

(張政烺文集)

ISBN 978-7-101-08601-0

I. 苑… II. 張… III. 雜著-中國-現代-選集
IV. Z429.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53390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張政烺文集
苑 峰 雜 著
張政烺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

880×1230 毫米 1/32·11 印張·插頁 2·220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42.00 元

ISBN 978-7-101-08601-0



張政烺先生

厚宣我久未通訊，甚念。歷史教學月刊
向承愛護，銷路日廣，遠達國外各地，為
答訂購者雅意，敬祈惠賜鴻金以
充篇幅，至感至盼。寧滬甲冑集已購
讀，深佩搜集之精，摹寫之工，及傳布
資料大公無私之偉志，倡年有作其佔

既學研界，其事更多，五四過梁茂修
頗談吾兄在滬情況，之屏已返國，將
在輔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英盟自
近代史資料甚多，不久定可一二公布，
願多近況如何！常見至，崇估謹復
敬禮
弟 政 上 月 廿 日

《張政烺文集》出版說明

張政烺，字苑峰，1912年4月15日生於山東省榮成縣崖頭鎮。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同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圖書管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46年應聘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1954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並兼任研究員。1960年被任命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並繼續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66年調離中華書局，專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先後擔任物質文化研究室主任、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先後被聘任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顧問；中國歷史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文物諮詢委員會委員、文化部中國文物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史學會理事等。2005年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張政烺先生一生踐行“真誠求實是為人為學之本”的信條，學問淵博，識見卓越，道德文章，人所共欽。在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考古學、古器物學、古文獻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做出了具有開拓性的重要貢獻，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2004年4月，在張政烺先生夫人傅學苓先生的多年推動和

學術界的通力協助下，彙編張政烺先生一生主要學術成果的《張政烺文史論集》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張政烺先生去世後，傅學苓先生承擔起整理出版張先生遺著的重任，繼續蒐集遺稿，委托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張先生研究易學的有關資料，編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 2008 年出版）和《張政烺論易叢稿》（中華書局 2011 年出版）；委托朱鳳瀚先生主持整理張先生對《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所作批注，編為《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中華書局 2011 年出版）。同時，傅學苓先生也一直在蒐集整理相關資料，準備對《張政烺文史論集》進行增補修訂。可惜的是，傅先生在 2010 年年中病重住院，於 2010 年 12 月 22 日去世。病重期間，傅學苓先生仍念念不忘《張政烺文史論集》的修訂和其他未出版著作的整理工作。

2011 年初，張政烺先生的哲嗣張極井先生約請朱鳳瀚、李零、林小安先生與我們會商，啟動《張政烺文史論集》的增補、修訂和重編工作；經廣泛徵求學術界的各方意見，並反復磋商，考慮到《張政烺文史論集》把各篇不同專題、不同類型的文章按發表時間編排，雖然可以瞭解張政烺先生學術發展的歷程，却難以清晰體現其學術特色和研究重點，且卷帙浩繁，不便讀者研讀，因此最終確定，將蒐集到的張先生存世的各類文字進行分類重編，成《張政烺文集》五卷。

《張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收錄張政烺先生運用甲骨金文研究商周歷史的論文及書信共 36 篇。其中 35 篇已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致裘錫圭討論殷墟卜辭“族”與“衆人”性質問題的信》一篇，係裘錫圭先生提供，為首次公開發表。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將《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列為《張政烺文集》的首卷，是考慮到張政烺先生一生精研

古文字和考古學，但他首先更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對甲骨刻辭和商周銘文的考證與釋讀，主要目的乃是解決上古史研究中的問題。

《張政烺文集》第二卷《文史叢考》，收錄張政烺先生關於古代文史方面的論文、隨筆、書信共 34 篇，均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張政烺先生一生博聞強識，在多個古代文史領域如考古學、古器物學、版本目錄學以及古代文學等方面都做過精深的研究，可惜系統成文並最終發表者很少，為學界引為憾事。本卷所收錄的文字，僅僅是張政烺先生研治古代文史的少量遺存，看似不成系統，但每一篇都能給後學極大的啟發。

《張政烺文集》第三卷《論易叢稿》。易學研究是張政烺先生晚年治學的重點。本卷以李零先生所編《張政烺論易叢稿》為基礎，為保持《張政烺文集》的體例統一，故略去了李零先生的前言和相關附錄。

《張政烺文集》第四卷《古史講義》，共收錄張政烺先生授課講義六種，大部分未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為此次新蒐集到的資料。其中《先秦史講義》兩種，1952 年本為王世民先生提供，1959 年本為陳紹棣先生提供，二者皆為油印本，非張先生親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張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學多年講授中國通史課程中的先秦史，而五十年代時北大歷史系的中國通史課程，系教研室共同討論授課提綱，體現了當時主流史學觀點。因此，講義中的一些學術觀點和表述，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未必與張先生自己的學術主張一致。但是，這兩份珍貴的講義，畢竟從多方面體現了張先生的治學成果和學術造詣，精義疊見，讓我們想見當時張政烺等名師為本科生講授基礎課的風采。

同時，張政烺先生曾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講授“中國考古學

史之金石學部分”。課程分爲緒論和五個單元，其中一、二、三單元當時有油印本講義，已經由王世民先生整理，命名爲《中國考古學史講義》，收錄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中。此次新編《張政烺文集》，我們商請王世民先生根據自己的課堂筆記，對當時未發講義的緒論和四、五單元作了整理，一併收入《中國考古學史講義》中，使這份講義得以以相對完整的面貌呈現出來。

1959年，北京大學在中文系成立了古典文獻專業，設有“中國文化史”講座課程，由陰法魯先生主持，邀請名師開設專題講座，其中的古器物學專題是由張政烺先生講授的，首次授課在1962年11月。收入本卷的《中國古代的禮器和日用物》，就是由向仍旦先生根據張先生的授課記錄整理的講義。

《張政烺文集》第五卷《苑峰雜著》，收錄張政烺先生自述、紀念文章、序跋、書評、書信、講話以及其他一些文字。此次新蒐集到的未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中的是：《斯人離世去，業績在人間——悼念尹達同志》（與楊向奎先生合著）、《關於“張楚”問題的一封信》、《致胡厚宣的四封書信》（胡振宇先生提供）、《在晉文化研究會上的發言》、《在湖南省博物館的學術報告》（高至喜先生整理並提供）共五篇；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第一版）中，我們輯得署名張政烺撰寫的辭條共13條，也一併收入本卷。另外，收錄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中的《中國歷史圖譜資料目錄》（封建社會部分）爲打印草稿的影印件，爲了方便閱讀，此次我們全部進行了排印整理。

多年以來，爲蒐集、整理和出版張政烺先生的著作，傅學苓先生苦心孤詣，謀劃整理，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學術界、出版界的許多同仁都給予了無私的幫助。爲編集《張政烺文史論集》，王世民、王曾瑜、史樹青、朱鳳瀚、呂一芳、安守仁、李零、李解民、吳

榮曾、吳九龍、何齡修、汪桂海、林小安、林永匡、胡振宇、孫關根、張永山、陳平、陳抗、陳祖武、程毅中、裘錫圭、趙平安、劉源、劉宗漢、劉樂賢、謝桂華、羅琨、顧青、關惠珍等曾參與文稿的整理工作。此次修訂重編《張政烺文集》，張極井先生在百忙中給予了全力支持和配合，並代表家屬撰寫了《回憶父親二三事——代〈張政烺文集〉編後記》；林小安、朱鳳瀚、李零、顧青、張繼海等先生用力尤著，王世民、裘錫圭、胡振宇、陳紹棣、鄭振香、高至喜、向仍旦、劉玉才等先生提供了新的資料，北京大學歷史系、中文系的部分博士研究生也參加了審校工作，在此，我們一併致以誠摯的感謝！

2012年4月15日，是張政烺先生百歲誕辰的紀念日。《張政烺文集》的出版，是我們對張政烺先生的最好的紀念！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2年3月

目 錄

我在史語所的十年	1
我與古文字學	7
郭沫若同志對金文研究的貢獻	29
忠厚誠篤 誨人不倦	
——悼鄭天挺先生	36
斯人離世去 業績在人間	
——悼念尹達同志	44
《商周古文字類纂》後記	52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出版附記	54
《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序	55
評《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	58
《殷契新釋》序	62
讀《古陶文彙錄》	64
《春秋後語輯考》序	68
《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序	74
《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前言	77
《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序	80
關於僞皇族案及《長沙古物聞見記》	84
關於江蘇儀徵胥浦西漢墓出土的《先令券書》的通信	87
關於今注本《金史》工作問題的通信	88
關於標點本《金史》的簡單說明	92

《文史》出版三十輯感言	93
關於古籍今注今譯	100
在中國書法家協會組織的古文字學家座談會上的發言	104
在“漢字、書法、美學、傳統文化”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	106
關於“張楚”問題的一封信	107
致胡厚宣的四封書信	109
在晉文化研究會上的發言	112
在湖南省博物館的學術報告	115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條目	123
《中國歷史圖譜資料目錄(封建社會部分)》草稿	146
回憶父親二三事	
——代《張政烺文集》編後記	340

我在史語所的十年*

一九三六年我進歷史語言研究所，被分配做圖書管理工作，至一九四六年離開史語所到母校北京大學任教，在史語所服務近十年之久，先後歷任圖書管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這期間正是國難當頭，人民顛沛流離的時期。史語所在傅斯年所長果斷和艱辛的籌劃指揮下，一九三七年秋全所人員攜帶大量珍貴資料遷往長沙，接着又輾轉大西南，一九四〇年才在四川南溪縣李莊安頓下來。當時的生活條件很差，工作環境也不安寧，但史語所始終堅持初創時的辦所方針，視學術工作為自己的職責，繼續組織人員開拓史料來源，整理和刊佈鮮為人知的新史料和方言調查報告。同時，著名學者寫出一批史學和語言學的論著，造就和培養了許多青年學者，在史學界和語言學界起着帶頭作用。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我同其他青年學子一樣，立足於本職工作，努力學習和運用與全所共存亡的大量古籍和各種新史料。我在中國古代史和版本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至今仍被學術界認可，當然是與史語所良好的學術氣氛和前輩提挈分不開的。

少年時期我接受的是舊教育，在家塾讀古書，漸漸養成了一種習慣。在北京大學讀了史學系，又與古書結下了不解之緣，畢業後傅所長又派我在史語所做圖書管理工作，更有機會遍覽史

* 本文由張永山整理。

語所藏書。傅所長是一位博聞強記的學者，他對圖書工作要求很嚴格，單就購書而言，規定買書不能重複，即使書名不同，內容重複的也不能買，但又不能遺漏有用的資料。這一要求看似簡單，做起來却相當困難，達到這一要求的前提是對所藏圖書心中有數。為達此目的，我儘快掌握所內藏書的種類和圖書的內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內多讀書，從歷史典籍、各家文集、筆記、天文曆算、農業、氣象、方志到古代戲曲、小說、俗文學等，從傳統小學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璽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圖錄及各家論著等等，無所不讀。在南京的那一年裏，掌握了所內藏書的家底，也鍛練了記憶力和辨析力，重點圖書的內容幾乎能背誦出來，自然在實現傅所長採購圖書的原則時就不會出現大的差誤。購書時我注意選擇那些經濟實用的好書，讓一定的經費發揮最大的作用。現在史語所有的中青年學者說，當年我挑選的書，對他們的科研工作有用的都有，沒用的都沒有。這樣的議論，反映出那時我們忠實執行傅斯年所長的治所方針，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受益於這種鞭策、培養，我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進一步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深刻體會到博與精的結合、舊文獻與新史料的結合，是新時代治史者成長的最佳途徑。只有這樣前進才能接近傅先生提出的擴張史料來源、研究新問題的主張。這一時期我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和《六同別錄》上的文章，如《〈說文〉燕召公〈史篇〉名醜解》、《“奭”字說》、《六書古義》、《邵王之諱鼎及殷銘考證》、《講史與詠史詩》、《〈問答錄〉與〈說參請〉》、《一枝花話》等，都是在這樣的治史思想影響下寫成的。

我喜讀古書，在汲取書中寶貴知識的同時，也留意古書的版本。在南京時，傅斯年所長正組織史語所有關人員核校《明實

錄》，而所內的版本不完善，他讓那廉君和我於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三月到南潯嘉業堂購買《明實錄》。這正是一次飽覽善本書的好機會。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是江南大藏書家之一。他所藏圖書雖無丁氏持靜齋、范氏天一閣、東倉書庫那樣多的古佚書，但却不乏宋、明、清中葉以前經史子集的佳品，還有各種年譜、金石著作等。順路還參觀了嘉業堂之外的藏書所和刻書局，看到善本書不可勝數，瞭解到某些刻古書的脈絡，開闊了眼界，鞏固和增強了我對古書版本及其流傳的知識和辨別能力。有了這次實踐，再細細品味所內藏書，基本理清某些書的版本源流，先後撰寫刊出《〈王逸集〉牙籤考證》、《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九四三年草成，只在友人中談論，一九六〇年趙萬里編《中國版刻圖錄》，採納了我的考證。一九九一年刊於《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後來撰寫的《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偽》（一九八九年刊於《余嘉錫先生紀念論文集》）等，也與我在史語所讀碑刻拓片積累的知識和經驗有直接關係。

在史語所令我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完成押運圖書入川任務。史語所遷到長沙不久，南京淪陷，全所人員又轉移到昆明，而傅斯年所長命我和潘實君携書入川。所裏有中文圖書十二萬冊，西文圖書一萬冊。我們在長沙租用怡和公司一條船，沿湘江而下，穿越洞庭湖，達漢口，又西抵宜昌。在宜昌中轉換船耽擱時間較長，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把書運到重慶。這批書完好地運達目的地，存放在沙坪壩新蓋起的三間大房子裏，為全所人員從昆明再遷四川南溪李莊開展科研工作，提前做好了準備。這是我到史語所後完成的最重要一件工作，當然是一大快事。西行入川任務下達後，我自願承擔為傅斯年所長鈔寫《性命古訓辨證》的上卷（中下卷已由陳鈍先生抄畢）。中轉換船在宜昌停留

兩個多月，我一邊看書，一邊核校書中引用金文資料出處，有時敵機轟炸就作罷。好在時間充裕，在宜昌抄完，到重慶呈所長審閱。先生把這點小事寫進序中說：“張苑峰先生（政烺）送古籍入川，慨然願爲我抄之，携稿西行，在停宜昌屢睹空襲爲我抄成，至可感矣。故上卷前月寄商務印書館，一段心事遂了，此皆苑峰、驥塵之惠我無疆也。”與其說先生謝我，不如說我應感謝先生，在先生大作未面世之前，我已學到先生治學的方法及其著作的精髓。《性命古訓辨證》一書的結論，今天看來未必完全妥當，但立論的依據較阮元的《性命古訓》更爲充實和精密。上卷開篇徵引西周金文有關生、令、命的材料，推尋其本義，進而結合兩周文獻中的性、命資料，探討性、命二字用法的演變、分化，以及隨時代變遷而發生的區別，而後再深入分析先秦性命說的來源、形成和變化。這種廣收新史料，結合文獻研究思想史的實踐，對後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很有影響。在此種治學思想方法的激勵下，我的治史道路更爲寬廣了，深挖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形式的出土文獻隱含的真實史料，與傳世文獻相互發明，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面貌，成爲我研究上古史始終遵循的一條原則。

史語所安陽殷墟發掘，是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壯舉，規模之大和收獲之豐富是空前的。由於衆多遺迹和遺物的發現，特別是記錄商王室占卜活動甲骨的再現，不僅恢復了三千多年前王都的概貌，而且改寫了晚商時期朦朧的歷史，真正把這段歷史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和文字史料的基礎之上，從此考古資料成爲譜寫中國文明史的重要史料來源。埋藏文字史料最集中的H127坑著稱於世，一萬餘片甲骨同出一坑。面對如此之多的“檔案”，發掘者本想科學地揭取和整理，偶然的原因使這一目

的未能完全實現。董作賓先生在《殷虛文字乙編》序中說：“H127 這一坑甲骨文字，是帶著泥土瓦礫，裝入一個特製的大木箱中，由安陽運至南京的。到京之後，箱子經過了翻轉，打開來時，是坑底朝天的”，“原來是龜甲的正面向下，現在都向上了。”H127 坑甲骨運到南京時的情況我親眼目睹。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一輛大卡車開進南京北極閣史語所圖書館前，車上載着一隻大木箱，數十人無法同時在車上作業，只有部分工人合力把大木箱從車上翻到搭在車尾的斜坡木板上，而後又沿鋪在臺階處木板斜面上推拉，好不容易運到圖書館的大廳內。發掘者興奮不已，令工人立即拆去木箱四周和頂蓋木板。衆人一看，眼前這堆與泥粘結在一起的甲骨，同原來堆積的方位正相反，底朝天了。現場工人卸車忙亂，指揮者集中精力協調工人卸車和鋪路，無暇顧及木箱的正倒，待拆開木箱見到甲骨底朝天，已經無可挽回了。室內發掘較為細緻，將底朝天的甲骨自上而下按層揭取、編號、繪圖，想恢復原來的堆積狀況。清理完畢，根據繪圖、編號結合甲骨文字判斷，認為甲骨是一次拋棄，沒有什麼層位關係。但用嚴格的田野考古要求來衡量，這一坑甲骨的發掘科學性受到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何況 H127 坑發現的當天，在兩小時不到的時間內已取出四千餘片甲骨，顯然現場來不及編號、繪圖，再加上室內發掘的具體操作人員不見得每片揭取後立即編號，揭取下來堆放在紙盒裏，過後再編號也是有的，這就難免不發生差誤。抗戰期間，史語所大轉移時，對甲骨的保護措施並不理想，我到昆明看到破損很嚴重，原來有的編號已失落，有的甲骨已散作若干塊，甚至有的當初就沒編號，而是在昆明補上去的。這些客觀存在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對科學整理和分析 H127 坑甲骨及深入細緻研究帶來一定困難。分期、分組研究是目前甲骨學